



民国教育家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研究

——以 1934 年有关文言文教育争论为中心

罗庆云 戴红贤

摘要: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教育家汪懋祖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有关文言文教育的争论。汪懋祖相继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文运动》、《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的探讨》等论文,它们基本反映了汪懋祖有关文言文教育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教育家汪懋祖长期学习、思考、研究和实践的结晶,值得人们重视。它们对于 21 世纪的语文教育有启迪意义,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汪懋祖; 文言文; 教育

1934 年,教育家汪懋祖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关于文言文教育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小学要不要学习文言文? 要不要读经? 白话文教材是否存在诸多弊端? 等等。在此期间,汪懋祖相继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①、《中小学文言文运动》^②、《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的探讨》^③等论文。几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检阅那场争论,我们发现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值得重视。本文拟以 1934 年汪懋祖有关文言文教育系列文章为中心,研究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探究汪氏文言文教育思想渊源,探讨其对于 21 世纪语文教育及文化繁荣发展的借鉴作用。

一、1934 年文言文教育之争概述

1934 年 5 月 4 日,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对湖南、广东等省当局强令中小学读经和教育部禁止小学诵读文言两种做法提出异议^④,认为“小学读经,固非合理,禁绝文言,似亦近于感情作用”,二者犯了“各走一端”的错误。由于文言文教育涉及的问题敏感复杂,汪懋祖的文章很快牵动了方方面面的神经,人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纷纷发表意见,比较有名的人物如吴研因、余景陶、柳诒徵、胡适、陶行知、傅孟真、容肇祖、鲁迅、何鲁成、任鸿隽、龚启昌、周淦、湘君、朱翊新等均先后参与讨论。其中反对汪懋祖最激烈用笔最勤者当属吴研因。1934 年 5 月 16 日,吴研因发表《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⑤,批驳汪懋祖的观点。6 月 1 日,汪懋祖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答辩吴研因。6 月 8 日,余景陶发表《小学读经与习文言文》^⑥,支持汪懋祖的观点。7 月 15 日,

①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载《时代公论》1934 年 5 月 4 日第 3 卷第 6 号,总 110 号。

②汪懋祖:《中小学文言文运动》,载《时代公论》1934 年 6 月 1 日第 3 卷第 10 号,总 114。

③汪懋祖:《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的探讨》,载《时代公论》1934 年 11 月 2 日第 3 卷第 32 号,总 136 号。
下文对于汪懋祖引文不特别标注者均出自此三篇。

④《教育部公报》1934 年第 17、18 期。

⑤吴研因:《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载《申报》1934 年 5 月 16 日。

⑥余景陶:《小学读经与习文言文》,载《时代公论》1934 年 6 月 8 日第 3 卷第 11 号,总 115 号。

胡适发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①,声援吴研因、批判汪懋祖。鲁迅也撰文批评汪氏“开倒车”^②。1934年11月2日,汪懋祖发表《关于小学国语教材之进一步探讨》,此文大概是汪氏有关文言文教育的最后一篇文章。尔后,赞同者和反对者继续争论^③,汪懋祖由于某种原因不再发言^④。1935年后,这场争论很快融入到规模更大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之中^⑤。

以上我们简单勾勒了发生在1934年的文言文教育之争。现以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发表的时间为起点,以《关于小学国语教材之进一步探讨》为终点,将发生在这7个月争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其一,中小学要不要学习文言文。以汪懋祖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不仅中学要学习文言文,小学也要学习文言文。以吴研因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小学“如必参教之乎也者的叙事说理等文,实在是治丝益紊而不得益的办法”,“小学生即不习文言文,毕业后也还可以看得,对于社会应用,实也不生问题。”^⑥

其二,中小学是否应该读经。汪氏认为小学读经不合理,它“违背儿童生活”;到了中学,读经是文言文学习的重要内容。吴研因极力反对小学读经,但他却认为初中可选读《孟子》。余景陶等认为小学应该读经,他说:“国文教材,应取第一流作家第一等重要之文字以为之……欲觅取第一等文字,当然须于经籍中求之。”^⑦

其三,白话文教材是否存在诸多弊端。汪懋祖认为白话文“发挥个人主义,毁灭礼教,打倒威权,暗示斗争……徒求感情之奔放,无复理智之制驭”。柳诒徵也认为小学白话教材许多文章“违反时代性与引起儿童卑劣凶暴之性质”。^⑧汪懋祖还指出:“近来文字,往往以欧化为时髦,诘屈不可理解,须假想为英文而意会之,始能得其趣味”。任鸿隽(叔永)说:“这样糊涂的文字,可以拿给小学生作金科玉律的念吗?”^⑨关于儿童文学,汪懋祖认为:“儿童初习语文,必资于直观及想象,故猫戏狗语,足以焕发兴趣。惟施之于五六龄之儿童则可,若儿童实际经验既已超过,则利用此种想象者,反足遏塞其想象力。”他还说:“初级小学适用语体文固矣,而鸟言兽语以及神仙荒诞之故事,与大部提倡科学之意似未相符……此之谓糖裹的兴趣。”以上诸问题,吴研因只承认白话文在语言表达上存在“恶劣”现象,而“其余的都是意见,在小学国语编辑者,实在是词以应对,而且振振有词的”^⑩。胡适一方面不满汪懋祖“每一段里总有几句痛骂白话拥护文言的感情话,使人不能不感觉这几条简单的主张背后是充满着一股热烈的迷恋古文的感情”,另一方面也认可汪(懋祖)、柳(诒徵)、任(叔永)等的批评。他承认:“白话的教材实在是太不够用了,实在是贫乏的可怜!中小学的教科书是两家大书店编的,里面材料都是匆匆忙忙的搜集来的;白话作家太少了,选择的来源当然是缺乏;编撰教科书的人又大都是不大能做好白话文的。”他希望“有第一流的白话诗、文、戏本、传记等等出来做‘真正有功效有力量的国语教科书’”^⑪。

争论双方阵容强大,各自“振振有词”,但都难免个人感情作用,因而在语言表述上都有用语不当、前后矛盾的地方。譬如酷爱文言文的汪懋祖,在前文反对湖南广东当局“强令小学读经”,后文却赞美“强令读经”的主要负责人何键、陈济棠辈为“豪杰之士”。而极力维护白话文的吴研因,前文拥护教育部的禁习文言令,后文却主张小学高级可参教古诗歌,初中可选读《孟子》^⑫。

① 胡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载《独立评论》1934年7月15日第109号。

② 鲁迅:《中国语文的新生》,载《新生》1934年10月13日第1卷第36期。

③ 如吴研因《读汪懋祖小学国语教材疑问之进一步探讨书后》(载《时代公论》1934年第3卷第32号),任鸿隽《小学国语教材与白话文恶劣》(载《时代公论》1934年第3卷第35号)等等。

④ 笔者注:汪氏搁笔的原因可能与他的身体和精力不济有关,同时也与他的主观情绪有关。他在《关于小学国语教材之进一步探讨》一文开头说:“近来胃病时发,不堪用思。”结尾又说:“关于以上一类的笔墨官司,我也有点厌倦了。”

⑤ 参见《教育杂志》第25卷第5号等。

⑥ 吴研因:《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载《申报》1934年5月16日。

⑦ 余景陶:《小学读经与习文言文》,载《时代公论》1934年6月8日第3卷第11号,总115号。

⑧ 柳诒徵:《小学国语教材之疑问》,载《时代公论》1934年第3卷第12号,总116号。

⑨ 任叔永:《为全国小学生请命》,载《独立评论》1934年第109号。

⑩ 吴研因:《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的批评〉的检讨》,载《江苏教育》1934年第3卷第10期。

⑪ 胡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载《独立评论》1934年7月15日第109号。

⑫ 吴研因:《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毕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载《申报》1934年5月16日。

二、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内涵及评析

我们以汪氏 1934 年系列文章为中心来研究他的文言文教育思想,并对它们进行简要评析。

汪懋祖认为,小学高年级应该学习浅近文言文,初中要能读毕《孟子》,高中能读《论语》《学》《庸》以及《左传》《史记》《诗经》《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选本,并辅以各家文选作为课外读物。汪氏为什么要逆流强调文言文学习?这就要了解他坚守的教育理念。汪懋祖认为,要重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但更要重视教育“预备生活”的意义。他极力反对教育界“过分重视儿童生活,而漠然于其将来之需要”的做法。他说:“若吾国则义教四年,尚不可及,则在此四年之中,似宜多顾‘预备’。凡社会需要应所重视,乡村环境尤当体察。”落实到语文教育,汪氏主张:“国语教学除技术之外,尚含有修养及提高语言之作用。”他认为文言文教育正有这些作用。具体说来,它们包括:第一,文言文“涵正当之思想”、“有公认的价值”,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第二,文言文有“先民精神所寄”,能让学生有“民族意识”。汪懋祖认为学生若缺乏接触文言经典的教育机会,就会导致他们对“先民所遗留之精神遗产”“无复留恋”^①。他赞同梁启超的说法:“以上各书(注:指《四书》、《左传》《史记》等 25 种),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第三,文言文在文字表达上较白话文有“诸多优点”。“所谓一字传神,最能描写文言之便利。”第四,文言文“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

在教学安排上,汪懋祖认为:第一,文言文学习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他主张初小习白话,高小开始习“浅易之文言”。他说:“吾所谓高小文言,当如欧阳修《养育记》,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之类,多选抒情记叙有味之文,并非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之文。”他认为《孟子》等难度稍大的文言文要到初中才读,高中再读难度更大的《论语》《左传》《庄子》等。第二,小学白话文比重大于文言文,高中要以文言文为主。汪懋祖说:“初级小学,自以全用白话教材为宜。而五六年级,应参教文言。”高中要“读《论语》《学》《庸》以及《左传》《史记》《诗经》《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选本,作为正课,而辅以各家文选,及现代文艺,作为课外读物。”第三,小学不读经,中学要加强经典学习。第四,文言文学习要重视诵读。汪懋祖说:“国文教学有三事焉,曰练习、曰思想、曰欣赏。而所以能法人情趣,鼓舞志气者,尤必资于诵读。”他还说:“吾幼读缠绵悱恻,或悲壮激楚之文,辄为泣下沾襟,何也?声与心通,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佳文必须朗诵,诗词必须朗吟。”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 20 世纪语文教育历程和成败得失,重新审视汪懋祖在 1930 年代的有关小学文言文教育论述,我们发现,汪懋祖小学文言文教育思想不乏前瞻性和合理性,但也存在局限性。

首先,我们来考察汪懋祖的教育理念。汪懋祖主张教育要偏重“预备生活”,此观念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社会动荡不安,民生维艰,物资匮乏,教育资源相当有限,正如汪氏所说“若吾国则义教四年,尚不可及”。普通民众能送孩子上学很不容易,他们希望孩子能学到有用的东西,最起码能读会写会算。“教育即生活”的观念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讲实在是稀有的奢侈品。

其次,我们来考察汪懋祖所看重的文言文价值。汪懋祖说文言文“涵正当之思想”、“有公认的价值”,此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间确有很多“正当之思想”,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但也有相当多的糟粕,如“上尊下卑”、“三纲五常”等。即使所谓“正当之思想”,其中也还涵有需要分析和批判的成分,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中的“礼”和“忠”,就要重新解释和批判。汪懋祖认为文言文能让学生有“民族意识”,这一点是正确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若失去传承,必然导致文化荒芜无根。即便在今天地球成为“村”的时代,也不可能全然丢弃民族意识。我们每一个人固然是“地球村”的村民,但更是本民族的一员。作为民族的一员,有义务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它。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主要由文言文承载。多习文言文,毫无疑问能够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汪懋祖所列文言文表达上的“诸多优点”,有些的确如

^①汪懋祖:《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之讨论》,载《中华教育界》1934 年 7 月第 22 卷 1 期。

此,有些值得商榷。如汪氏认为文言“省便”,该说法比较准确。文言文总体上的确较白话文简省。但汪氏认为“文言文便于叙事、说理、议论、应用,而壮烈之节,激昂之气,尤有资于文言”,此说法有失偏颇。经典文言作品确有上述优点,但经典白话作品也一样能做到,只不过汪懋祖当时能见到的经典白话作品稀少而已。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想掌握好白话文,需要多读文言文,从文言文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关于文言文“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这个说法在当时应该是成立的。但随着社会变革和白话文广泛运用,文言文“社会应用所需”的范围就越越来越小了。

汪懋祖对文言文价值的挖掘,对文言文教材的看重,其实最根本的一点是:文言文具有经过时间检验和筛选后的“经典性”。汪懋祖说“文字一道,其可保存流传,堪为模范者”必经“长久之选择,有公认的价值,而不为时间性所拘束”。而当时的白话文教材,就缺乏这样的“经典性”,它们当中确实存在大量的思想“不正当”、内容贫乏、语言不优美甚至恶俗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再加上剧烈的社会变革,各种思想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小学教材中进进出出,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国文教材的经典性和稳定性^①。基于这个原因,汪懋祖大声疾呼中小学要加强文言文学习。

最后,我们审视汪懋祖中小学文言文教学安排。汪氏认为,文言文教学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这个做法是科学的,它既照顾到儿童的心智兴趣,又引领儿童逐渐接受文言文教育。汪氏主张小学阶段白话文的比重应大于文言文。此安排比较合乎儿童特点,也合乎时宜。汪氏并非思想偏狭、顽固保守者,他很看重小学阶段白话文的学习。他指斥白话文,只是指斥那些思想不健康、语言表达不清楚、文字毛病诸多的不经典不优美的白话文。高中阶段,汪懋祖主张要以文言文为主,这个观点颇值得重视。高中课堂上究竟该全部学习文言文,还是该全部学习白话文,还是各占一定的比例?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仍需讨论和研究。关于读经,汪懋祖认为,读经是文言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汪氏不主张小学读经,而是安排在初中和高中阶段。这个安排考虑到了小学生的生理年龄、心理发育、智力机能等因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汪懋祖似乎看低了小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忽略了小学生良好的记忆功能。我们认为,小学生可以读点浅近易诵的儒家经典,如《诗经》《论语》中的若干篇目。汪懋祖认为“读书习惯必自中学养成”,实际上,读文言文的习惯可以自小学养成。这有大量实例可证,譬如传统私塾出来的学生,其文言阅读和应用能力往往比多读了好几年新式学校的学生强。汪懋祖还呼吁文言文学习要重视诵读,这很符合语言学习原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活生生的东西,只有通过朗读,才能将语言复活,才能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才能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得到语感。令人遗憾的是,汪懋祖当时指出现象,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

以上可以看出,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内涵比较丰富。除一小部分受到个人眼光和时代局限外,绝大部分是科学合理的。汪懋祖对文言文教育价值的认识,对文言文教学安排的建议,值得当今语文教育界重视和研究。

三、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探源

人类活动中任何思想都有其来源。在1934年的那场争论中,汪懋祖小学文言文教育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人们不禁要问:汪氏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与哪些因素有关?

为了探寻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的渊源,有必要先了解汪氏的生平事迹。1934年9月《教育杂志》刊登了《我们的特约撰述》^②,文中介绍汪懋祖生平如下:

汪懋祖,字典存,江苏吴县人,生于1892年,现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主任。毕业江苏高等学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得学士硕士学位,并为哈佛大学研究员。曾加入中国科

^①清末“分科教学”以来,中小学语文教育目的时有变迁:清末以修身、忠君、尊孔、爱国为主;民国初,革除忠君尊孔等价值教育,加入民主、自由等价值内容;民国四、五年,受袁世凯称帝政治影响,民主、共和等思想退出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民国十年后受世界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成了“缺少民族精神和国家思想”的世界通用读本;民国十六年后,中小学语文教材成了宣讲“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的宣传材料等。这种现象诚如周谷城所批评的“国文教学上……把国文看成纯粹灌输学术思想的科目,而丧失了训练文字技术的效用”(周谷城:《文字与教育》,载《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24号)。

^②《我们的特约撰述》,载《教育杂志》1934年9月复刊号(第22卷第1号)。

学社,中华教育改进社,教育学会,儿童教育社,乡村教育社,测验学会,职业教育社等学术团体。历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南京中学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

在此基础上我们略加补充:1916年汪懋祖官费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导师是孟禄、杜威等。留美期间的1919年至1920年,他担任袁观澜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翻译,撰写《美国教育彻览》一书^①。1920年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22年参与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②,1927年回乡创办苏州中学。抗日战争期间,赴云南大理、丽江等地劝学,创办国立大理师范学校、丽江师范学校等,并受聘西南联大。1946年回苏州治病,1949年病逝。

由汪懋祖的生平可知,他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学校,没有离开过教育。他是一位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教育工作者。

汪懋祖自称其教育学说为“新儒家的教育思想”,其教育目标是要塑造“自动,自立,自治,健全体格,科学头脑”和“守法,服务,责任心,通力合作之精神”的健全国民,同时这样的国民又具备孔孟儒家的理想人格^③。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是其“新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结合汪懋祖“新儒家”教育思想来探讨其文言文教育思想的来源。

我们认为,汪懋祖“新儒家”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首先,与他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有关。汪懋祖出生于读书世家,十三岁中秀才,幼受家庭熏陶,饱读诗书,熟悉中国文化典籍,传统文化深深扎根于他的思想中。其次,与他留学美国有关。汪懋祖1916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杜威的及门弟子,同时又受白璧德等人的影响。据他说,1919年9月,他在哈佛大学旁听白璧德讲课,白璧德让他“多信孔子”。1920年3月,他随袁观澜赴纽约参观,亲聆纽约图书馆馆长 Winner 谈教育。Winner 主张“教育之真义,必于古典中求之”^④。不过总体来说,美国学者中对汪懋祖影响最大的还是杜威,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学说是汪懋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最后,与他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关。汪懋祖很年轻时就积极参与各种教育活动:写文章,办杂志,站讲台,办学校,组织教育学会,参加教育讨论,等等,可以说他不知疲倦地为20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的教育工作了一辈子。据钱穆回忆,汪懋祖晚年在病榻上还在笔耕教育学著作^⑤。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让汪懋祖的教育思想有了民族的根;杜威等人的影响,让汪懋祖有了现代化的先进理念;教育实践活动,让汪懋祖有了实际经验的积累,使他的教育思想能够切合现实生活。正是这些营养,孕育出汪懋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儒家”教育思想。他的文言文教育思想就是在他的“新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需要辨明的是,在1934年汪懋祖对文言文教育的“呐喊”中,有人怀疑他是“受人指使”^⑥。我们无论从汪懋祖一生的教育活动还是从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的渊源来看,该说法都站不住脚。何况早在1934年之前,汪懋祖就进行了大量有关文言文教育活动,他的文言文教育思想,很早就显露出来。钱穆回忆:“典存初在北平时,白话文方盛行,而典存有意保存传统古文。至是,意不变。”^⑦其实早在1913年,年仅22岁的汪懋祖发表《论挽救国文》^⑧,文章写道:

窃谓国文浅陋,即一切国粹,无从问津,而其弊之最著有二。一对于道德之观念,青年学

①汪懋祖:《美国教育彻览》,中华书局1922年。

②《新教育》1922年第5卷第3期。

③汪懋祖:《教育学》,正中书局1942年。

④汪懋祖:《汪懋祖留学日记》,转引自《中小学文言运动》,载《时代公论》1934年6月1日第3卷第10号,总114。

⑤钱穆:《师友杂忆·苏州中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149页。《师友杂忆·苏州中学》记载:“时典存已病,余常去问候,典存起坐床上,余坐床榻旁,每相语移时。典存应上海某书局约,方拟撰一书,……乃有关文辞文学之教学方面者。余往,典存必告其最近所撰之作意。”

⑥周作人《苦茶随笔·〈现代散文〉序》(1934.11.16)说,民国的古文复兴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现在汪懋祖不知何据,但不妨假定为戴公传贤罢”等等。此说实乃主观臆测。

⑦钱穆:《师友杂忆·苏州中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149页。

⑧汪懋祖:《论挽救国文》,载《独立周报》1913年3月第24期。《独立周报》首发于1912年9月22日,故笔者推断24期应在1913年3月。汪懋祖时年22岁,在北洋大学读矿科。

子,根底未固,醉心欧化,凡西人一言一行,必服膺模仿,往圣名教,等诸糟粕,未得其长,先染其恶,下之则冥行盲从,罔知抉择。自由平等之说,深入脑际而莫得其真解,其危害于人心者可见也。一对于国本之观念,我国立国五千年,自有其大经大本。今祛专制而跻共和,政体虽革,名教不废。急进之徒,喜欧米物质之美,而不知国学之宏且精也。于是欲举社会千百祀相传之根本,一旦尽弃其旧而谋其新,曾亦思种植先考土宜,求果必须推因,橘逾淮为枳,雀入海为蛤,削足适履,徒见其自戕而已。凡此皆国文未通,故其观念,往往而非。坐是两害,而爱国之心,因之渐移,文亡而国亦随之。

作为一个才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汪懋祖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他看到了文言文的重要,认为“国文浅陋,即一切国粹,无从问津”,认为文言文事关传统文化,事关青年学子的“道德”和“国本”,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未来。他的这些看法,反映了他很早就具备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和相当的学术胆识。

1917年,汪懋祖在《留美学生季报》^①上发表《论文以载道》,批评白话文运动的弊端。1918年又发表《致〈新青年〉杂志记者》,他说:“白话作文,为增进国民智识之利器,仆亦竭诚鼓吹。但须力避意俗,意俗即不能美,不美即失其文之作用……贵报既提倡白话文,即宜实行此宗旨,示人以模范。”很显然,汪懋祖赞同白话文,认为“白话作文为增进国民智识之利器”,但他不盲目跟进,而是理性思考,在“竭诚鼓吹”中保持一分清醒,这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实在是难能可贵。

1927年,汪懋祖创办苏州中学。苏州中学的成功与汪懋祖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他办苏州中学的教育理念显然是杜威教育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他主张“教育源于生活,又要改变生活”,“必使各个学生毕业出校以后,有转移环境的能力,而不为不良环境所屈服,始克表现苏中之精神”。他还说,“一所优良学校成绩的表现,不仅在毕业生多数能考取大学,或中学会考能得到锦标,而在入学后能独立研究学术,崇高人格,出大学复能发展其能力,以各得其用,此亦清醒的教育家所当注意的。”^②

以上可见,汪懋祖在1934年论争中所表述的观点,非一时兴趣之作,也非“应时”之作。他的文言文教育思想,是他长期学习、思考、研究和实践的结晶。

四、余 论

近百年来,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围绕中小学文言文教育,人们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1934年,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汪懋祖引发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有关中小学文言文教育的争论。争论的引发似乎有些偶然,但实际上它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关系纠结各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如思想文化方面,传统儒家学说与“五四”新文化的矛盾;语言文学方面,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教育学方面,以儿童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冲突,等等。

几十年前,汪懋祖大声疾呼要重视传统文化,要重视文言文教育。然而,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由于目不暇接的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汪懋祖的呼声被淹没了,文言文教育也日渐式微了。直到今天,语文教育的问题依然严峻,汪懋祖所担忧的语文教育失误造成的不良后果已渐次显现。因此,回顾近百年文言文教育的历史,探讨上个世纪杰出教育家汪懋祖的相关思想,这对于21世纪的语文教育有启迪意义,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罗庆云,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56。

戴红贤,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百年小学文言文教育研究”(10YJA740067)

■责任编辑:桂 莉

^①汪懋祖:《论文以载道》,载《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第4号(民国六年冬天)。

^②汪懋祖:《苏中事业之回顾与展望》,载《苏中校刊》1933年第86期。